



· 社科大讲堂系列丛书 ·

SOCIAL SCIENCE
ENCYCLOPEDIA

文学卷下册

社科大讲堂

主 编○刘迎秋 副主编○文学国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社科大讲堂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 社科大讲堂系列丛书 ·

SOCIAL SCIENCE
ENCYCLOPEDIA

社科大讲堂

文学卷 下册

主 编○刘迎秋

副主编○文学国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科大讲堂·文学卷/刘迎秋主编.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096-1552-2

I. ①社… II. ①刘…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文学—文集 IV. ①C53②I-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4556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邮 编: 100038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北京银祥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 陈 力

责任编辑: 徐 雪

责任印制: 黄 铄

责任校对: 李玉敏 曹 平

720mm × 1000mm/16 57.25 印张 1090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8.00 元(上、下册)

书 号: ISBN 978-7-5096-1552-2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邮 编: 100836

电 话: (010) 68022974

上册

“80 后”的现状与未来	白 烨	(1)
文化多样性问题	朝戈金	(15)
文学规律之一		
——新世纪小说研究随想	陈众议	(27)
“理论热”过后对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盛 宁	(37)
语言多样性与濒危语言问题	黄 行	(55)
《水浒传》成书年代考证	石昌渝	(65)
口头文学研究的十个误区		
——20 世纪民俗学的学科反思	尹虎彬	(75)
萨义德·福柯·马克思主义	赵稀方	(95)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	张中良	(119)
文学与图像	高建平	(137)
语法与认知	沈家煊	(155)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抑或“跨文学的文化理论”？		
——关于当代文学理论的境况态势与发育		
路向的反思	周启超	(189)
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起点、逻辑与方向	姜 飞	(205)
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启示	盛 宁	(229)
畅销小说的文化政治问题	叶舒宪	(243)



文学治疗	叶舒宪	(255)
人道是一种力量	陆建德	(267)
20 世纪西方文学艺术研究的发展历程	高建平	(281)
“形式化”·“语义化”·“意向化” ——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追问的不同 路径之比较	周启超	(291)
中国叙事文艺学的可能性	钱 竞	(309)
后现代批评 ——以日本为例	赵京华	(323)
一个定义,一种历史 ——威廉斯对英国文化研究发展史的理论贡献	金惠敏	(333)
美学与艺术向日常生活的回归	高建平	(341)
中国的民族和语言	黄 行	(353)
20 世纪西方美学的几个问题	金惠敏	(363)
关于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	吴福祥	(379)
略论现代斯拉夫文论研究的基本旨趣	周启超	(413)
保卫和发扬法兰西文化在 20 世纪末	余中先	(421)
计算语言学和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研究和应用综述	傅爱平	(433)

下 册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反思	董之林	(457)
日本的中国学 ——以鲁迅研究为例	赵京华	(499)
后现代历史观念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赵稀方	(513)
国学方法论	叶舒宪	(533)
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生活与文学	赵 园	(547)
文艺学研究的跨文化视野	王 蓓	(555)



论文学艺术历史书写中的双向互动关系	高建平	(567)
“美学”的起源	高建平	(579)
百年反思		
——中国 20 世纪文艺学学术史问题	杜书瀛	(601)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概观		
——以马尔库塞文艺研究为例	丁国旗	(627)
中国现代文艺学的起源	钱 竞	(655)
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文化还原及其理论阐述(上)	彭亚非	(677)
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文化还原及其理论阐述(下)	彭亚非	(701)
感知现象学与感物说	史忠义	(727)
语言表达艺术	姚喜双	(749)
日俄战争与中日现代文学的发生	董炳月	(767)
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	刘丹青	(779)
国学的传统与创新	聂鸿音	(799)
本质抑或反本质:当代文论的两种思路论衡	党圣元	(813)
英语自由诗的源起和发展	傅 浩	(831)
俄罗斯的文学地图	刘文飞	(851)
中西:语言与思想制度	尚 杰	(879)
后记		(893)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反思

董之林



董之林

女，1952年生，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

主要著作：《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盈尺集——当代文学思辨与随想》（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追忆燃情岁月——50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走出历史的雾霭》（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主要译著：《接受美学理论》（台湾骆驼出版社，1993年），并发表论文、评论和译文多篇。



一、引言

把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作为“文学—文化前沿”讲座中的命题提出，是因为我认为，一个学科的建立，有待于对它的历史进行叙述。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之间，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及其小说，被批得体无完肤，甚至被逐出文学史讲堂。重提这一段文学，重提它的小说部分，不是出于历史怀旧，或者有所谓的再一次“拨乱反正”的企图，而是出于我对一种历史叙述的不信任。应该说，这是学术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也是深化研究的前提。

显然，接下来我所说的关于历史反思，不是一个纯粹思辨性的哲学问题，而是通过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观念，重新探讨“十七年文学”。是否否定“十七年文学”，主要取决于这个时期的作品是不是当时政治或政策的传声筒？如果它们是“服膺政治”的产物，也就是与政治关系密切，那么它们有没有文学性可言？值不值得进入文学史，成为当代文学历史叙述中一个有效的环节？对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先不要轻易地说“是”或者“不是”，而应该先看一看这一时期的文学和历史的联系。这便联系到我关于“十七年小说”的另一个观点，即它的历史相关性问题的。我认为任何时期的文学，都不是“横空出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而是生长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或者与这种环境的前后左右有关，处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当代文学、“十七年小说”也莫不如此。

大家都知道，“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小说“起于休息”，^①这是20世纪初鲁迅对诗歌和小说起源的概括。就小说而言，鲁迅的话简洁而平实地表明，这种文体始于为生活提供的一种消遣。近代以来小说的影响越来越大，不断有学者考察小说如何受佛教以及变文的影响，如何受传统诗歌和散文的影响，并分析

^①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20 世纪初伴随西学东渐，西方十八九世纪文学使中国现代小说观念发生的变化，追溯小说文体变迁的历史……于是，中国小说也就摆脱了“自来无史”，在文学史上“其量不及全书之什一”^① 的备受排斥的境遇，一跃而为文学的重镇。

小说命运在历史上的转折，固然有政治、历史等多方面原因，但究其底里，还是与其表述方式有关。小说后来在文学中显赫的位置很容易掩盖它最初的身世。实际上，自近代以来，一些学者在为小说做翻案文章的时候，恰恰是注意到了小说通俗浅近的特点，由于它的特点使其更易于接近民众，便转而将其作为实行思想启蒙教育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所以，康有为说，小说“易逮于民治，善入愚俗……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② 梁启超则引日本维新为例，“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说明小说是“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效力者”。^③ 鲁迅青年时期弃医从文，也是为了启发民智，疗救世人麻木的精神状态。小说通俗浅近的表现形式一旦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政治见解联系在一起，小说也就从原来“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君子弗为”^④ 的卑下境遇中彻底改观，成为现代知识精英实现救国救民理想的重要形式。一方面，他们的文学成就很难和思想启蒙的政治理想相分离；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在“改造国民性”方面，的确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自“五四”以来，凡是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青年，很少有没读过现代小说的，很少有对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小说家一无所知的。现代知识分子以小说为工具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同时，不仅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也改变了小说的历史，使小说成为考察中国社会、政治和历史都不能不涉猎的领域。

现代小说和紧随其后的当代小说，与现代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并不是说，现代社会以来，所有的小说都与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在这方面的差异是明显的，否则就无法解释，“在 40 年代，战争分割的不同生活空间、生活经历与体验的多样性，使作家获得‘进入’艺术创造的多种方式”，^⑤ 像沈从文、张爱玲的一些政治意识不十分强烈的小说。但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巨大的政治变革使小说与政治的关系骤然紧密起来。

因此，当我们走进新中国初期的小说领域，就会看到这样的文学现象：这些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

②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

③ 任公：《饮冰室自由书》。

④ 班固：《艺文志》。

⑤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文学评论》1998 年第 6 期。



作品共同的一点是，作家都对新中国诞生这一历史事件怀有由衷的喜悦和兴奋的心情，并通过描写不同的生活侧面来表现新的历史进程，讴歌新的时代、新的社会风貌，勾勒新人素质及其思想道德风貌。其中文学的想象方式，集中表现在作家对新的社会生活的期待上，尽管所期待的各有不同。因此作品在表现手法上也不拘一格：既有传统的白描，勾勒人物和事件的大致风貌以传神，又有受西方小说影响，侧重人物内心活动的心理剖析，通过创作主体对生活细部的观察以洞微烛隐；既有回顾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对宏大的战争场面做全景式扫描，以再现史诗风韵的长歌，也有撷取生活沧海之一粟，描写变革时代凡人小景、春种秋收的散曲；既有讴歌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乐章，也有描写英雄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对比较复杂的人生况味的低吟浅唱。在作品题材范围，初步形成“十七年小说”中都市生活、农业合作化运动和革命历史题材三水分局的格局。后来伴随政治形势起伏跌宕，这三种流向在不同时期的状态也不均衡，但直到“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小说家创作的视阈依然受影响。这是1949年后小说创作为后来奠定的基础。特别是当时那些作品并不圆熟的写作范式，体现了新的文学在与新的社会互相交融时一种新奇而大胆的形象。

这是就“十七年小说”的历史生成而言。如果我们进一步联系那种说这一时期的作品背离了文学轨道，缺乏文学性，因而没资格进入文学史的说法，就会产生一种疑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没有一种可以完全摆脱政治和社会历史的“纯文学”？如果没有，那么为什么会有从这种角度出发，否定“十七年小说”的论点？

我的疑问，并不是怀疑持上述看法的研究者善良的学术动机，所怀疑的是这种启蒙者的姿态很难贯彻到底。关于文学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为一个问题，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一直被争论不休。追根溯源，其实希望文学摆脱政治干预的看法早已潜藏在变动不居的生活史中。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经历，既漫长，又多灾多难，这就使无数文学志士仁人在战乱、颠簸与贫病交加的生活里，内心幻化出一个美妙的纯文学或纯艺术之梦。但世事无情，现实总难满足人们的主观愿望，哪怕这愿望相对于宏大的历史，仅仅是一点微小的吁求。文学无法回避政治、时代的影响，不仅“十七年文学”以新中国建立为起点，“新时期”改革开放这一幕历史，仍然作为文学史分期中重要的标志。因此，问题不在于用巨大的政治变更作为文学史分期点，而在于以不同时期的政治为前提，先验地对文学进行了等级划分。否则，就无法自圆其说：一个时期受政治影响的文学就是文学，另一个时期受政治影响的文学就不是文学。尽管不同时期的文学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大家接受文学时的心情也有所不同，但文学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这一事实，恐怕任何人都无法回避。



二、反思的由来及其理论观念

首先我想说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理论所建构的一种学术氛围。当然，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大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这里我主要谈的是这种理论构想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特别是在我国 80 年代现代化进程迅速展开以后，在社会上弥漫着的将启蒙现代性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唯一途径的气氛当中，这种学术氛围对文化多元性的体认与倡导。

先要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台组织的一组谈话。这组节目旨在讨论人文科学当时的理论趋势，在《大理理论的复归》（*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总标题下，分别有对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米歇尔·福柯、托马斯·库恩、约翰·罗尔斯、约根·哈贝马斯、路易·阿尔杜塞、年鉴派史学家等，这些在当代产生重大影响思想家的评介。把这些谈话编辑成书时，该书主编、剑桥大学政治学学者昆廷·斯金纳增加了书目和阅读指南，还增加了“德里达”和“列维—斯特劳斯”两章，书名就叫《人文科学中大理理论的复归》（*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Human Science*），并由王绍光、张京媛等学者译成中文，于 1991 年 12 月由社会理论出版社（Social Thought Press）出版。

把这些看起来有着诸多差异，甚至彼此对立的理论家放在“大理理论的复归”栏目一起展示，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是，一般人只注意到他们在具体理论上的差异，纠缠于具体问题，却忽略了那些理论家彼此之间的相同点，即上述理论都与“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认识背道而驰。因为在持“终结”论者看来，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还是后来的这些理论家，他们是一些“试图系统阐述普遍的社会和政治哲学的人仅仅被看作是糊涂的跟不上科学时代发展的老派人物。与此相关，实证主义认为只有抛弃过时了的混淆客观描述和价值判断的大理论研究，才能完成建立真正科学和价值中立的关于社会行为和社会发展的‘实证理论’的任务。这一切使得两千年来关于社会的哲学思考看上去似乎就要突然终止了”。^①

这个节目的主持者认为，正是由于多年来在人文学科领域，以为只有零碎的经验主义研究才值得称道的看法占了上风，才形成如此看法。他是这样表述的：由于那种零碎的经验主义研究“占了上风”，形成这种局面：“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以及所有乌托邦社会哲学则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大理理论的复归”主要表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在西方，启蒙现代性“时过境迁。过去的一代人又开始实践并鼓吹乌托邦社会哲学；马克思主义重焕青春并展现出令人眼花缭乱

^① 昆廷·斯金纳：《人文科学中大理理论的复归·前言》，张京媛、王绍光译，香港社会理论出版社，1991 年。



的各种形式；拉康及其追随者又赋予精神分析新的理论基础；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继续反映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相似之处；女权运动带来了一系列以往为人忽视的洞识和论点；在纷纷攘攘之中，英语世界社会哲学界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堡垒不断受到阐释学者、结构主义、后经验主义、解构主义和其他人入侵思潮一浪接着一浪的威胁和侵蚀”。^① 换句话说，关于社会进程及其发展模式的理论，不应该“终结”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而应该形成一种多元文化相互对话、彼此沟通的后现代局面。

具体到我们自己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领域全面展开，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无不马首是瞻，百年来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在这里形成一个爆发点，“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此趋势下，当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一种以西方启蒙话语为标志的元叙述。特别是对“十七年文学”，这种元叙述以服膺政治、否定个性为由，认为这一时期的作品没什么文学价值。如果翻看当时有关“重写文学史”的材料，就会看到对柳青、赵树理等当代文学中有代表性作家的批判，赵树理小说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当时对“十七年文学”的再叙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工农兵方向”这些词句，已不再是评定标准；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把作品统统斥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封资修黑货”不同。可悲的是，建立在启蒙话语基础上的元叙述，具有比以往任何时期的批判都难以企及的摧毁力量，甚至把这一时期文学逐出文学史讲堂。在形而上哲学的意义，这是现代性在“全人类”名义下，不同于以往“阶级”革命的另一只粗暴，另一种粗糙。

这种粗糙究竟忽略了什么？中国作为跻身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行列的后来者，相对主流，其文化和文学呈现出一种交互关系的边缘性。文学中，这种边缘性主要体现在它对现代社会演化过程的复杂体验和独有的表现。尽管文学发展与现代化关系密切，而且有些作品从语言到结构，俨然现代主义文学派头，但差异毕竟是其核心。因此在文学史领域，无法套用西方或其他民族国家任何一种叙述模式加以比附。以启蒙话语为背景的文学史判断，恰恰忽略了文学表现这一边缘过程的复杂性，忽略了根植于本土的叙事文学特点。

这种粗糙也并非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启蒙话语为标志的文学史观，或者说，这种元叙述的确立，不完全出自80年代对西方思想的横向移植，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革命文学内部就有表现。当时无论解放区还是国统区，“革命文化人”对赵树理小说并不十分认同。^② 究其原因，不是他们对革命文学、大众

① 昆廷·斯金纳：《人文科学中大理论的复归·前言》，张京媛、王绍光译，香港社会理论出版社，1991年。

② 杨献珍：《〈小二黑结婚〉出版经过》，《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文学的口号有怀疑，他们是革命文学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但受“五四”以来苏俄和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影响，却不自觉地表现出对来自基层社会，不符合流行的现代文学观念的作品的不屑与轻慢。在解放区，赵树理小说被鼓吹为“工农兵文学方向”，即便如此，在知识的层面，他的艺术表现也远没有获得普遍认可，并一直延续到后来，被当作“十七年文学”与“五四”新文学断裂的例证。如果把小说模式看作一种“知识”，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相比，这里的确出现了“知识”链条上的“断裂”，确切地说，是一种变异。但历史似乎有意与叙述者捉迷藏，制造“断裂”的陷阱，以掩盖处于现代主流趋势的边缘的文学特点，掩盖连接本土上下文的历史相关性。

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写”中得以镜鉴和深化，因此“重写”并没有错，而是“重写”中的问题值得关注。今天看来，20世纪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再叙述缺乏建树有客观原因：长期封闭的环境，使人们在理论上一时找不到恰当有力的切入点。但也不能忽略主观上的原因，在急于实现经济乃至文学现代化的焦躁心理驱使下，即便概念推陈出新，理解上也有失偏颇。例如，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谈到“反思”（Reflection，中文意为：反射、影像、倒影、反省、沉思、反映），他对反思的理解并不是“逆反”或“对着干”。他认为反思不仅涉及对象客体，更主要的是对于那种与对象相关的主体的“思想”或包含主体自身的思维方式。因此他说，“反思”的哲学本意，不仅在于它所“关怀的”对象客体，也包含“思想对客体的关怀，故而它既关怀着客体，又关怀着思想”。^① 20世纪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否定，恰恰缺乏对主体思维方式的反省，进而重复了“十七年”至“文革”以来的“大批判”思路，尽管批判者说法上有所不同。但正如以一种“一体化”的思维方式，无法解开“一体化”形成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死结一样，把复杂、动态的历史看成铁板一块，只要认定文学与政治脱不了干系，而且对这一时期政治的否定意见又占了上风，就以强调个人和个性的启蒙话语为依据，将它们统统打入地狱，来一次历史上的重新站队。事情好像解决了，但问题是，几番站队之后，历史变成虚无主义狂欢的场所，更谈不上研究的深入。

关于政治结构和人类主体的关系，社会学家认为：“结构绝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施加在人类主体之上的强制性因素，相反，它们是能使人有所作为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结构的二重性。从原则上说，结构总是能够从结构化过程的角度去加以认识。”^② 这里所说的“结构”主要指政治与人类主体的关系，而意识形态与

①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文版），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② A. 吉登斯：《论社会学方法新规》，黄平译，载韩少功、蒋子丹主编：《经典文献卷：是明灯还是幻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文学也隐含着这种结构关系。结构化过程的二重性在于：一方面，结构是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建构出来的；另一方面，主体的实践活动又是被结构化地建立起来的。

对“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元叙述问题在于，先验地确定有一个悬置于主体实践活动之上的社会与文学结构，只是由于当时的作家、批评家没有明智地加以选择，他们的实践活动和艺术经验便不得被排除出宏大的历史叙述。与这种天真的愿望相反，在本土文学实践之外，人们找不到另一处“标准化”的、叙述者一相情愿的历史。何况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主体的王国是受到限定的。人们创造了社会，但他们是作为受历史制约的行动者来创造社会的，而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去创造的”。^① 在此意义，没有不受制约的历史，只有受到历史限定，却在限定中有所作为的人类主体；没有能够脱离意识形态的文学，只有因文学参与而绝非单一化的意识形态过程。

历史学家把历史比喻为复杂的基因工程，认为“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不可分割的‘一个连续体’。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因果关系”。^② 现实由过去发展而来，今天文学中隐含历史的酵素，未来文学也必然在相关的历史基因中发展起来。赵树理的小说，以及围绕他作品一系列争议所构成的文学现象，凸显了中国文学处于现代化交互关系中曾有过的边缘感受，也孕育着现实与未来文学的走向。

三、以赵树理小说为例

出于我对以往“十七年文学”历史叙述的怀疑，我翻阅了有关赵树理小说的研究资料。我发现越是深入历史，越发感觉历史本身也有生命，复杂而充满变数。但被遮掩了历史细节的宏大叙述，仅凭一些异地条款便做出决断，全不顾多种因素相互缠绕、不断碰撞和妥协的过程，就等于轻易断送了历史的性命。

20 世纪 80 年代，对赵树理的评价，由“文学的方向”遁入“不折不扣的功利主义”泥淖，使他成为这一时期文学（从“解放区”到“十七年”）缺乏艺术水准的代表。对赵树理作品的非议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工农兵文学”的反智倾向；二是“问题小说”的服膺政治倾向。两者之间，服膺政治是主要问题，反智是由此带来的表现形态。

① A. 吉登斯：《论社会学方法新规》，黄平译，载韩少功、蒋子丹主编：《经典文献卷：是明灯还是幻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②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赵树理在解放区刚享有文名，他的作品不同于“五四”新文学的特点就引起人们注意。历史的吊诡在于，80 年代对赵树理小说的否定意见，当时曾以肯定的面目出现。比如，当时左翼文化人和批评家纷纷称赞赵树理响应“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号令，代表“工农兵方向”，因此才取得文学上的成就。这一点正是 80 年代赵树理为人诟病的主要问题。40 年代批评家对赵树理的肯定，却为日后批判埋下伏笔，虽然当年他们绝无此意，但这样的后果，也暗示在前期肯定和后来否定之间有某种联系，或者说，存在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实际上，解放区的“革命文化人”开始并不怎么欣赏赵树理这位“农民作家”。^① 杨献珍回忆《〈小二黑结婚〉出版经过》时说，1942 年他调赵树理到北方局调查研究室工作，第二年 7 月，赵树理下乡回来交给他一篇小说，这就是《小二黑结婚》，并由彭德怀交太行新华书店付印。“当稿交到太行新华书店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时的太行区文化界思想仍然有些混乱，也还存在着一种宗派主义倾向……有些自命为‘新派’的文化人，对通俗的大众文艺看不上眼”。小说迟迟不能出版，杨献珍只好再去找彭德怀，“向他说明情况”。这一次，彭德怀写下“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的话，并“亲自交给了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同志，由他转交太行新华书店，小说才得以出版”。《小二黑结婚》“10 月份出版后，受到太行区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仅在太行区就销行达三四万册”，“许多村子的群众自动地把《小二黑结婚》改编成秧歌剧，自演自唱，可见群众之喜爱了”。与赵树理小说在基层受欢迎的景象相比，知识界就冷清多了：“仍然有些知识分子对《小二黑结婚》摇头，冷嘲热讽，认为那不过是‘低级的通俗故事’而已”，甚至说：“这是海派”。^②

由于彭德怀、杨献珍和北方局领导出面干预，赵树理小说出版后又受到“太行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形势有所扭转，特别是延安整风以后，经过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③ 至 1946 年左右，肯定的意见才越来越多，《华北文化》、《文汇报》、《解放日报》、《北方杂志》、《群众》、《文萃》、

① 1947 年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土地改革会议。赵树理同志以文艺界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在此期间，《人民日报》发表新闻，称他为“农民作家”。史纪言：《赵树理同志生平纪略》，《汾水》1980 年 1 月号。

② 杨献珍：《〈小二黑结婚〉出版经过》，《新文学史料》1982 年第 3 期。

③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分别是在 1942 年 5 月 2 日和 5 月 23 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 年），据《赵树理年谱》记载：“1943 年 10 月 19 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刊载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于二十日发出通知，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为整风必读文件。”（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 年）也就是说，对《讲话》大范围的普遍学习应该是在 1943 年以后。——笔者注